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辅导材料

一九八一年七月

说 明

为了深入领会《决议》精神，我们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等七位同志作了关于学习《决议》的辅导报告，现编印成册，供学习参考。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文件

廖 盖 隆

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要我结合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讲一讲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精神。我现在就讲一讲我对这个决议的认识。我讲话的题目是《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文件》。我讲得不好的地方，请同志们不客气地批评指正。我分为九个小题目来讲。

一、关于六中全会及其历史问题决议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在六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举行的。会议的议程有两个。一个是讨论和通过刚才所说的历史问题决议。另一个是通过接受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的请求的决议，并改选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新增加的党中央副主席，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全会选举胡耀邦同志为党中央主席，选举赵紫阳、华国锋同志为新增加的中央副主席，选举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全会决定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共七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回顾了党的六十年战斗历程，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这些事件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以及这些事件所以产生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前进的方

向。这次全会还作出了其他重要决定。历史将证明，这次全会是我们党的又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确实，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就是在于，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基本上完成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工作，也就是基本上完成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基本上完成了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改组工作，这是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是为了保证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实现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党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是在全党广大同志和全国广大人民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下实现的，自从一九七六年春天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四五”运动以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就在强烈地要求实现这样的拨乱反正。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政治上和组织上所作出的重大决定，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所实现的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和前途的伟大历史转折，除了苏联、越南和台湾蒋帮是照例地加以攻击和咒骂之外，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普遍重视。六中全会的重大决定，不仅得到社会主义的友好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欢迎，而且受到日本、美国、欧洲各国的报界的相当一致的欢迎。其所以这样的原故是因为，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和这些国家不同，但是这些国家的报界人士看到，它们同中国在对付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战争威胁方面有战略上重要的共同利益，因此它们就宁愿看到中国的政治安定和日益强大，而不愿看到中国的内部动乱和日益孱弱。这些国家的报界一般都认为，六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是诚恳的、有份量的；中国共产党在纠正毛泽东同志晚期的左倾错误的同时，仍然遵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基本原则，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永久价值。各国报界特别

注意到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是和平地民主地进行的。这表现出中国的现领导在广度和深度上正在加强民主，因此，中国领导人的更换不是标志着中国的衰落，而是标志着中国的复兴。

我们确实应当认识到，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制度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因为我们已经能够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用和平的民主的方法、用政治的方法，无痛苦地解决自己内部的思想政治矛盾。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经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的矛盾，是指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指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后面这种矛盾，事实证明，是可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来解决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在晚期，未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以致演成“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内乱。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能够通过非对抗性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矛盾这个客观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这个真理的最好证明。

我们在高度评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成就时，也应当指出，我们党还没有全部完成拨乱反正的工作。在指导思想，必须通过教育和学习的方法进一步实现全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的认识的统一。所谓认识统一，是指路线、方针、政策上，基本问题的结论上的统一，不是要求大家一字不改地重复决议。有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当然还可以研

充。在组织上，为了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也必须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来进一步调整和更新各级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实现这些任务是不会不遇到困难的，但我们一定要实现从指导思想到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上述一切理由看来，胡耀邦同志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叫做“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叫做“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文件”，也是同样正确的。因此，我就把讨论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这次讲话的题目叫做《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文件》。

二、关于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有人问：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什么要写上一大段《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呢？这是不是做文章走了题？或者是画蛇添足呢？回答是，这不是做文章走了题，也不是画蛇添足，因为：第一，党走过的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是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二十八年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十二年两个阶段在内的，这两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两个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以及党在这两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是分不开的；第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的问题，这个问题，离开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历史功绩，以及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是不可能得到说明的。而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著作，这占了毛泽东著作的大部分，而且这些历史经验，就其科学原理来说，对今天和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仍然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第三，还因为我国三十多岁以下的青年，包括青年的共产党员，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压迫，也不知道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不知道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

二十八年的牺牲奋斗创立起来的；为了使广大的人民和青年正确认识我国的历史，为了发扬我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传统，也有必要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

这个决议一开头在第一节就说：“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第二个问题：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的历史应当怎样分期呢？历史决议的第二节讲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三节讲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我认为，把第二、第三两节合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的党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这就是：（一）党的创立时期，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二三年二月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因“二七”大罢工的被镇压而转入低潮为止。这大体上也就是到一九二三年国共两党决定合作的时候为止。（二）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包括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可以从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党转而致力于组成国共合作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时算起，而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是从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开始到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背叛了革命时结束的。《毛泽东选集》的分期目录中，把这个时期叫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现在的历史问题决议叫做“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后两个名称的含义都不很完整、也不很确切，但内容是一样的。以上两个时期共历时六年，这是党的幼年时期。（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或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这是党先后克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而特别是克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终于找到了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的时期。（四）八年抗日战争，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这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下，空前地发展壮大的时期。（五）四年解放战争，或称全国解放战争，或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是中国革命力量经过同反革命力量的决战，终于战胜反革命，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时期。

我想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的作用呢？历史问题决议在第五节中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我打算分为以下五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应当归功于谁？首先，如同历史问题决议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因此，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人民，因为归根到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经过牺牲奋斗争得的。但是中国各族人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争得这个革命胜利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其次应当归功于党和党的领导，其中就有党的杰出的领袖们的巨大功绩在内，这些领袖们中，为首的是毛泽东同志。

第二，毛泽东同志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他就投身于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和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并且致力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那时，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要“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因此，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他指出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并且同陈独秀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尖锐的斗争。

第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寻找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为克服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危害，作了艰苦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他就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

军的经验，而指出了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就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开始产生了。但是这个理论和路线却受到了历次左倾错误领导，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斥，这就使得党在苏区和白区的力量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途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时，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

第四，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系统地形成的。八年抗日战争，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空前地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四年解放战争，也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果断地排除了外来的干涉，以革命战争去消灭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八百多万军队才取得胜利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也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正如历史问题决议第二十八节所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曾经帮助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帮助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援助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共产国际在一九三五年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对中国也有过一些好影响。苏联还援助了中国抗日，尤其是出兵东北消灭了关东军，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援助。我们建国的初期，苏联也援助过中国的建设。但是根据高度集中的原则组成的共产国际以及在共产国际中处于领导地

位的苏联，从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远在成万公里之外的莫斯科来指挥和控制中国革命，是不可能不犯重大错误的。这种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对他自己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陈独秀迁就国民党、投降国民党的一切重大决定都是得到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的代表的批准和支持的，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中，都表现了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幻想，更是一直在把中国革命引向右倾方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从右的极端走到左的极端，这就是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来源，而且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人如米夫之流强加给中国党的。如果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这种所谓“国际路线”作坚定不移的不屈不挠的而又很有艺术的斗争，中国革命事业早就一败涂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又从左的极端走到右的极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又排除了王明从苏联贩卖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排除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不断的直接干涉，坚持了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正确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又企图把中国革命约束在美苏两国共同控制和瓜分中国的所谓雅尔塔协定规定的格局范围内，又是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勇敢地排除了这种无理的约束。甚至就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在蒋介石军队的一切精锐师团和主力都被消灭以后，苏联仍然企图用妥协的方法结束中国革命。其目的仍然是美苏联合控制中国和瓜分中国。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地打破了苏联的这种无理的企图。以上所说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因此，正如历史问题决议第五节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如果那样的话，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取

得胜利。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我们党可能还在做秘密工作。许多国家（包括许多东方国家）的革命历史和我国一样长，甚至更长，它们的革命至今没有取得胜利，甚至没有接近胜利，就是明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同志等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充满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的苏联领导集团及其宣传家们，始终为他们自己和王明之流的叛徒的错误辩解，他们十分仇视和恐惧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是十分可笑而荒谬的。他们梦寐以求的是控制中国，恢复和扩大沙皇俄国在中国的利益。他们把变中国为苏联的殖民地叫做“国际主义”。这些背叛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叛徒，过去和现在都在咒骂中国革命，但这也不过是心劳日拙而已。

三、关于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三十二年的历史，总起来应当怎样看，应当作怎样的基本估计呢？历史问题决议在第六节里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就是说，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历史中，基本的、占主导地位的一面，不是我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的阴暗面，而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光明面。因此，看三十二年来的历史，首先要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巨大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成就是，我们打倒了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中国的主要剥削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又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就根本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

质，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历史问题决议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历史问题决议接着在第七节里，具体说明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我们在政治、社会主义改造、经济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外交五个方面取得的政权、统一、独立、社会经济改造、工业、农业、商业贸易、文化、国防、外交十项重大成就。

这十项成就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成就，即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政权，是巩固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和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其次是第四项成就，就是在社会经济改造方面，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再次是第五到第八项成就，即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相当可观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四是第九项成就，即国防建设方面的成就，这是保卫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的。

第五是第十项成就，即在外交方面，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我国在外交方面的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只是我们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的一个方面，固然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三十二年来的历史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还不够大，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过不少的失误。关于这一方

面，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第八节中指出：“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里指出了三十二年间我们党的领导的主要错误有两个：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我们在下面将会讲到，这主要是指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大跃进”的错误，其结果是造成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十年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如果没有发生这些错误的话，我们取得的成就当然一定会大得多。

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了对待三十二年来的成绩和错误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错误态度是忽视错误和掩盖错误。采取这种态度会使我们不能从错误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因而将使我们继续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就会招致更大的错误。因此采取这种态度是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犯了上述错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和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和否认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至于把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历史，描写成为一片黑暗，一笔抹煞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故意散布悲观失望情绪，那就更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造谣污蔑了。我们对于敌人的破坏阴谋要提高警惕。正如决议所指出，我们所以一定要肯定和重视三十二年来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的经验，是因为“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这些成就和成功的经验是我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继续前进的阵地，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阵地。

因此，总起来说，我们对于三十二年来的成绩和错误的问题应当采取的

态度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是使那些成功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汲取教训。总之，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加满怀信心地、更加富有成效地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四、关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党的历史，按照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是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五年这样四个时期来叙述的。就严格的历史分期来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又包含了两个时期。一个是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及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另一个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从一九五三年一月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这两个时期加上后面的三个时期，共为五个时期。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仍然把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当作一个时期来加以说明。

而且，把这七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看本质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七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所作的一切，可以概括为“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毛泽东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又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因此，建国后的头七年，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是建国前的二十八年。有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的。第一，一九二七年以后建立的根据地的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社会也可以说是新民主主

义社会，但它和前者不同，它已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有些史学工作者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提法和一九五三年以来我们党中央所有文件的一贯提法。他们认为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胜利，或者说没有基本上胜利，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没有开始；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中国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基本上解决。他们主张把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下限定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他们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二年底我们所从事的基本革命斗争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而仍然是民主革命，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仍然是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一句话，就是主张把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作为民主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完成民主革命的阶段。按照这种意见，我们党史的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划分就要大加修改，民主革命阶段不是二十八年，而是三十一年；社会主义阶段不是三十二年，而是二十九年了。按照这种意见，我们就有了两个不同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二年底，这个人民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在新区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即从一九五三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这种意见，中国的过渡时期，就不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算起，而要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了。按照这种意见，不仅一九五三年以来我们党的文件都要修改，而且六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历史决议也要修改了。因为这个决议第三部分标题明明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第六节明明说，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历史，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提出要把民主革命阶段的下限划在一九五二年底的史学工作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即：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是由这个革命推翻的是什么政治上层建筑，建立的又是什么政治上层建筑来决定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革命之所以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因为它们推翻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它们建立的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一九四九年十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革命，之所

以是既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又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是因为这个革命推翻的是中国的主要剥削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这个革命所建立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权，它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性质，比一八七一年的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政治革命同时取得了基本胜利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和一九六〇年初关于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都作出过清楚的说明。当然，一些史学工作者提出的上述意见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可以继续研究的。我在上面所说，不过是表明我个人对这种学术观点的看法。如果我说错了，我欢迎批评指正。

上面说的也不限于一些史学工作者的意见。历史问题决议第十一节第二段的个别提法也同决议的第三部分的总精神同第六节、第九节的提法不一致。我认为上述个别提法不符合事实，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

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第九节概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七年的基本历史过程，并且对这个时期党的工作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决议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决议的第十节对建国以后的头三年，即通常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过程作了概括的说明。这个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主要斗争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五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是人民解放军继续向长江以南、西北和西南进军，歼灭了一百多万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残余武装和土匪，和平解放了新疆、西藏等地区、同时通过镇反运动消灭了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因而建立和巩固了各地各级

的人民政府，也就是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治权力；

第二，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逐步收回了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居于国民经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因而使工人阶级除开掌握了政治权力以外，又掌握了经济权力。而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和“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则巩固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权力。以上两项，是决定我国人民在这个时期所从事的革命斗争的主要性质的东西；

第三，党领导我国人民在这个时期进行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是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质上就是巩固工人阶级获得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斗争；

第四，这个时期在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区农村完成的土地改革，是属于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附带完成民主革命阶段的遗留任务的性质，一方面，它本身解决的是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同时，土地改革的完成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我们从革命一胜利就面对着的中心任务。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就开始转移到这方面来了。但恢复国民经济并不是孤立进行和在旧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结合上述各项斗争和工作去进行，并且是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新的基础上进行的。

到一九五二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二十七亿二千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点九，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